

# 什么样的男人做家务<sup>\*</sup>

## ——情感表达、经济依赖或平等性别观念？

刘爱玉<sup>1</sup> 庄家焯<sup>2</sup> 周扬<sup>3</sup>

(1.2.3.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关键词:情感表达 经济依赖 性别观念

摘要:文章以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中城镇18-64周岁、目前在婚且有工作和劳动收入的非农业男性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男性人群承担家务劳动的状况以及影响要素。研究揭示:男性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就对于其家务劳动投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受制于可用的时间,再次是性别角色观念与夫妻感情,男性家务劳动的承担不存在“性别表演”现象。本研究的新意在于:在经验验证了时间约束、性别角色观念、相对资源视角之外,证实了家务劳动作为情感表达而存在。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5)03-0020-09

Men Who Do Housework: Expression of Emotions,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Gender Equality Attitude

LIU Ai-yu<sup>1</sup> ZHUAN Jia-chi<sup>2</sup> ZHOU Yang<sup>3</sup>

(1.2.3.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 expression of emotions; economic dependence; gender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men's share of housework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data, gathered through the Third National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Women, on married non-agricultural urban male workers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64, who have employment earning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men'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success has the highest effect on men's participation in housework, next to which is their disposable time, followed by their views of gender roles and affection for their wiv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men's share of housework cannot exist just for "gender performance". It exists because of men's expression of their affection, apart from the factors of their time, their gender attitude and their relative holdings of resources.

### 一、问题的提出

家务劳动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为满足其成员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需要进行的无酬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家庭成员的性别分工以及女性主导家内劳动的现实构成了两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恩格斯指出,由于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出于财产的保全和继承的目的,使得家庭日益变成私人领域,隔绝于社会生产的公共领域,妇女的家务劳动

也日益变成一种私人事务,妇女日益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sup>[1][2]</sup>。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家内劳动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而事实上妇女通过家内劳动生产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重要的商品——劳动力的再生产。男性正是通过占有妇女家内劳动的成果从而完成了对妇女的剥削。妇女从事的家内劳动因为没有被交换,而被当成了没有价值的劳动。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在于妇女未付酬的家务劳动。

作者简介:1.刘爱玉(1964-),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劳动社会学。2.庄家焯(1988-),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3级博士研究生。3.周扬(1991-),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

\* 基金项目: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项目编号:10@ZH020)。

如何将妇女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妇女参与到公共事业和社会职业中去,成为妇女解放的关键。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sup>[2]</sup>。从这个方面来看,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对于减轻妇女家务负担、实现性别平等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虽然总体上男性比女性承担更少的家务劳动是不争的事实,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家庭内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分配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从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来看,2010年男女从事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比起2000年已有大幅的减少(2000年男性比女性少做105.1分钟家务,2010年则只少做61.8分钟)<sup>[15](PP116-129)[35](PP31-41)</sup>。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在家内分工和家庭观念上出现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男性群体并非完全同质。就其内部结构而言,不同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情况会有区别。有些男性会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超过其妻子。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城镇已婚从业者中,有接近22.8%的家庭的家务劳动采取夫妻合作的模式,在高层次人才中,这个比例达到了33.0%<sup>[3](PP72-73)</sup>。在男性和女性承担家务时间差距缩小这一判断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关注那些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男性人群的特征。一是关注客观层面上的男性家务劳动时间,做多做少与什么样的因素有关;二是关注主观层面上的家务劳动量,自我认定分担了家庭中一半甚至更多家务劳动的男性,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研究回顾

社会学者们经常用以解释家务劳动分工趋势及性别差异的理论视角有:时间约束理论(time constraint theory)、性别角色理论(gender-role theory)和相对资源理论(relative resource theory)<sup>[4](PP253-294)[5](PP816-833)</sup>。本文认为,家务劳动也有可能是家庭成员(包括夫妻)之间的一种情感表达,因此,我们从四个方面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

#### 1.时间约束与家务劳动

从时间约束理论看家务分担,其核心思想是家务劳动时间会受到一个人可以支配的“有效时间”(time availability 或 available time)的约束。个人可支配的时间可以分为工作时间、闲暇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三部分。男性会在家务劳动上投入多少时间,取决于其如何对三个部分的时间进行取舍。家庭经济学的观点强调个人会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配置时间。工资率、家庭财产、商品价格等外生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家庭成员时间配置的变化<sup>[6](PP33-58)</sup>。男性因这种比较优势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劳动力市场上<sup>[7][8](PP348-364)</sup>,如果丈夫相对于妻子的教育、职业、收入地位更高,这些资源强化了其市场工作的价值,则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时间会少<sup>[7](P81)</sup>。男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少,是因为其工作时间长,没有余力或更多的时间担负家务劳动。而女性婚后和成为母亲之后则因其工作时间收益的比较劣势而承担更多家务劳动。工作时间与家务劳动时间之间存在着一种负向关系。

---

妇女虽然开始广泛参与社会劳动,经济、教育地位提升,但这并未显著降低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比例。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在最近的几十年并没有显著变化。参见 Coverman, S.. Explaining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85, 26(1): 81。那些妻子挣得比丈夫多的家庭,妻子担负的家务劳动比例依然高于丈夫,甚至在那些丈夫不工作的家庭也是如此。参见 Brayfield, A. A.. Employment Resources and Housework in Canada[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92, 54(1): 19-30。即使在两性平等水平较高的福利国家,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也不及女性的1/2。参见 Bianchi S. M., Milkie, M. A., Sayer, L. C.. Is Anyone Doing the Housework? Trends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J]. *Social Forces* [H. W. Wilson - SSA], 2000, 79(1): 191; Killewald A. & G. Micheal. Money Isn't Everything: Wives' Earnings and Housework Time[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0, 39(6): 987-1003。中国的数据也是如此。全国妇联自1990年以来进行过三次妇女地位调查,调查显示,城镇已婚男性1990年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123.7分钟,平均而言比女性少96.5分钟,2000年平均每天用以家务劳动的时间为75.1分钟,比女性少105.1分钟,2010年平均每天用以家务劳动的时间为45.1分钟,比女性少61.8分钟,参见杨菊华:《传统与策略:1990-2010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第31-41页。

由时间约束理论可以推出的假设是：

假设 1 :劳动力市场工作时间越长的男性 ,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短。

## 2.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务劳动

研究发现 ,男性对家务劳动的参与未必与其在市場中的工作时间相关<sup>[9](PP205-233)</sup> ,拥有时间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的家务参与。Julie Brines 发现 ,失业的丈夫虽然时间充裕 ,但为了维持男性尊严和男性气质 ,他们更少参与家务劳动 ,同样 ,如果夫妻持有强烈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话 ,有时间的丈夫也未必做家务<sup>[10](PP652-688)</sup>。这些研究说明 ,工作时间、闲暇时间、家务劳动时间的取舍安排 ,受制于一整套关于“谁应该在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的观念尤其是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性别角色观念指有关男女应当遵从怎样的社会规范、社会角色分工、性别关系模式及其行为模式等观念<sup>[11](PP101-110)</sup>。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人多习惯性地认为两性间存在固化的性别气质与社会分工 :相信男性的性别气质为坚强、有责任感 ,并与女性温柔、有依赖性的性别气质对立 ,相信性别角色的公私领域分工 ,即男性主要以在公共领域的发展为主 ,而女性以家庭为中心 ,相信在两性关系上男性为主 ,女性为辅。有关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是性别观念中的核心要素<sup>[12](PP1009-1039)</sup>。

中国社会由于其文化上的独特性 ,性别角色观念对家内分工影响更大。封建社会围绕着“双系抚育”而形成中国家庭的两性分工与合作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家庭观念和社会制度<sup>[13]</sup>。封建社会用宗法和礼制维护了“男女有别”的男女分工体系 ,在家内分工上形成了“男主内 ,女主外”的分工模式。明清以后 ,随着江南商品经济和乡村手工业的发展 ,江南女性广泛参与手工业生产。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作用显著提高 ,也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则较为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妇女在乡村手工业中的作用<sup>[14]</sup>。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 ,传统性别观念向现代性别观念转变 ,现代性别观念强调男女平等 ,打破性别传统分工 ,女性进入公共领域 ,两性共同承担社会与家庭责任<sup>[15](PP116-129)</sup>。

既往关于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务劳动时间的经验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将其看作相对独立的要素 ,探讨其影响状况及与其他要素之间的

关系。如一些研究发现 ,持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男性承担的家务劳动更少 ;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强于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妻子承担家务劳动的多少更多地受到丈夫性别观念的影响 ,而不是相反<sup>[16](PP299-322)</sup> ,具有平等性别观念的男性和女性会更平等地承担家务<sup>[7][8][10][17](PP91-113)</sup>。家庭责任观念对两性有不同的影响 ,把家庭责任看得比工作更重要的女性 ,在成为母亲后会减少工作时间 ,而男性则会在成为父亲后用更多的时间工作<sup>[18](PP747-772)</sup>。二是将性别角色观念与相对资源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着重探讨相对资源因性别观念之影响而展示的“性别表演”(gender display)问题。J. Brines 的研究发现 ,由于受性别文化的影响 ,丈夫即使挣钱少 ,也可以少做或不做家务 ,这是性别分工观念在起作用。“性别表演”假设主要由 Brines 通过拟合丈夫较妻子的相对收入与妻子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二次项关系而进行操作化<sup>[10]</sup> ,此后许多学者也是继续沿用此方法对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重新检验<sup>[19](PP585-595)[20](PP186-214)[21](P272)</sup> ,关于中国家务劳动参与方面是否存在性别表演 ,基本上也是采用此种方法<sup>[22](PP166-192)</sup>。“性别表演”使得那些挣得少的男性有时通过减少家务劳动以彰显男性气质<sup>[10][19]</sup>。

结合上述讨论 ,我们关于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务劳动之间关系的假设有 :

假设 2 :性别角色观念假设。男性越是趋向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则越有可能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

假设 3 :性别表演假设。男性越是趋向传统性别观念 ,随着相对收入的减少 ,越是会促使其进行家务劳动方面的性别表演。

## 3.相对资源与家务劳动

研究发现 ,控制更多资源的配偶会有更强的协商地位 ,并可更好地实现其预想的结果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状况下 ,拥有更多资源(教育、收入与职业地位)的一方从事的家务劳动将少于其配偶<sup>[10][20][21]</sup> ,即家务劳动参与及参与的多少与其相对资源的拥有状况有关。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家务的原因是其更多地经济上依赖丈夫 ,而男性则因在经济上更少依赖妻子而承担较少的家务<sup>[10][19]</sup>。有学者以妻子的相对收入来测量其对丈夫的经济依赖 ,发现妻子家务劳动时间与其丈夫的收入之间是负相关<sup>[8][20][23](PP259-272)[24]</sup>

(P191)。齐良书使用中国 9 个省 3819 个双收入家庭 1989-2000 年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议价能力的提高确实能减少本人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但其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对男性的效用远大于女性<sup>[25](PP78-90)</sup>。周旅军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是,相比于丈夫,妻子更有实权的会在高分位点上显著增加男性的家务投入,在中等分位点上减少女性的家务时间,即家庭权力状况对于不同性别、不同收入分位点上人群的影响有所不同<sup>[26](PP90-101)</sup>。Feinian Chen 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就业关系转变会影响家务劳动分工,经历了由农业职业向非农职业转变的一方,其家务劳动时间会减少<sup>[27](PP831-851)</sup>,说明夫妻间一方职业地位的变化会对家务劳动分工产生影响。教育程度高于丈夫的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更少<sup>[28](PP16-22)</sup>。对于城镇已婚在业男性而言,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对家务劳动参与有显著作用,特别是在高分位点上。相对于丈夫受教育程度低于妻子的情况,丈夫受教育程度相当于或高于妻子都会减少丈夫的家务劳动投入<sup>[26]</sup>。

有学者指出,不仅是相对资源,个体的绝对资源对家务劳动分工也有重要意义。绝对收入反映了妻子或者丈夫的经济自主性。更多的收入意味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参与的自主性<sup>[29](PP399-417)[30]</sup>,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减少家务劳动量<sup>[10][31](PP81-90)</sup>。Sanjiv Gupta 的研究比较了相对资源与绝对资源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更强调了女性本人的资源、地位所带来的自主性对于其家务劳动承担更为公平模式的意义<sup>[30]</sup>。

不过,相对资源对于家务分工作用的想法受到了多重挑战,主要是一些学者在经验研究中发现,妻子相对收入的增加并未能持续地减少其家务劳动时间,存在妻子的收入超过其丈夫时,她们依然会比收入低于丈夫的妻子做更多家务的现象<sup>[10]</sup>,并将之概括为“性别表演”,这也正是上文在讨论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务劳动之间关系时所提到的。“性别表演”的存在,体现了性别观念与经济依赖之间的复杂互动对于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不过已有关于“性别表演”的经验研究,更多的是针对女性研究对象而言,对于男性家务劳动参与是否也存在此种现象,有说服力的经验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国内相关研究比较欠缺,而对之进行检验,也是本文的目的。

针对家务劳动参与研究中传统的相对资源和绝对资源理论,本文提出 2 个假设:

假设 4:相对资源越少的男性(经济依赖越低者)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

假设 5:绝对资源越少的男性(自主性越大者),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

#### 4.情感表达与家务劳动

尽管有以上各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人们的家务劳动分配,但是这些理论均没有将情感因素考虑到家务劳动中,忽视情感因素在家务劳动分工过程中的作用有碍于我们对家庭关系的全面理解<sup>[32](PP337-351)</sup>。因为家务劳动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表达对家庭成员情感的方式<sup>[16][33](PP158-180)</sup>,也就是说,家务劳动虽然和人们在工作场所中的劳动一样均被称为劳动,但是在家务劳动过程中包含的情感表达是人们在家庭之外的劳动所不具有的。诚然,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但是其首要基础是感情,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关系也越来越由“工具型”转向“情感型”<sup>[34](P327)</sup>。在家庭中,不论是做常规性家务还是抚幼养老,夫妻的共担必然形成一条纽带,促进互助互信、情感温暖、关系亲密、家庭和谐。家务上的付出与承担有助于夫妻体会到共建家庭的喜悦与感动,是维持夫妻关系、增进夫妻情感的有效途径<sup>[35](PP31-41)</sup>。因此,男人干更多的家务活,可能是出于对妻子的爱,或者是为了维系更好的夫妻关系,分担家务劳动可以看作是丈夫对于妻子的一种情感表达。关于家庭内部的情感劳动的研究也发现,丈夫做的各种家务劳动,更容易被妻子视为丈夫对她的一种情感性支持<sup>[36](PP888-900)</sup>。2011 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男性认为“分担家务”成为美满婚姻的首要因素<sup>[37]</sup>。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证实,男性承担部分甚至大部分家务的家庭,夫妻关系更为融洽,丈夫多做家务有助于婚姻稳固<sup>[38](PP1-26)</sup>。

根据这种认识,提出:

假设 6:夫妻情感好的男性,其从事的家务劳动越多。

#### (二)研究变量及基本特点

##### 1.数据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依据 2010 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该

调查以 2010 年 12 月 1 日为时点,采用了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方法,第一阶段抽样单位为县、区和县级市(京津沪为乡、镇、街道),全国样本初级抽样单元为 460 个,各省区市的独立样本初级抽样单位为 40 个左右,第二阶段抽样单位为村、居委会,每个初级抽样单位随机抽选 5 个村、居委会,并按城镇化水平确定村、居委会的样本结构,第三阶段抽样单位为家庭户,每个样本村、居委会随机抽选 15 户,最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家庭户中,采用特定随机方法确定各类个人调查问卷的受访者。调查共回收个人问卷 29698 份。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城镇 18-64 周岁、目前在婚且有工作和劳动收入的非农业男性劳动者,共 4334 人,其中 3265 人在调查时为工作日,文章主要讨论的是这部分男性的家务劳动承担状况及其影响要素。

## 2. 变量界定与基本特征

本文从两个方面考察男性家务劳动承担情况。一是客观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指受访者回答的工作日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包括准备食物、打扫卫生、清洗衣服、购物等。2010 年城镇已婚男性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间的平均值为 45 分钟,最小值为 0,这样未做家务劳动的男性占 38%,最大值为 480 分钟,有 16%的男性工作日的家务劳动时间多于 110 分钟(2010 年城镇已婚女性工作日平均家务劳动时间为 107 分钟),男性家务劳动时间的标准差为 53.04。二是自我认定的家务劳动承担量。问卷询问了被调查对象最近一年在做饭、洗碗、洗衣服/做卫生、日常家庭采购、照料孩子生活、辅导孩子功课、照料老人等七个方面承担家务劳动的情况,选项为“从不、很少、约一半、大部分、全部”,本文将其分别赋值为 0、1、2、3、4 分,七个方面的得分相加,最小值为 0 分,最大值为 28 分,经极限标准化处理后生成了一个百分制计量的变量,分值越低,承担家务劳动越少。由七个方面构成的家务劳动量的信度系数为 0.89。2010 年城镇已婚男性自我认定的家务劳动承担量为 35.7,标准差为 14.7。从分布上看,大约有 12%的人自我认定的家务劳动量超过了工作量的一半。从

主客观两个方面对家务劳动承担情况进行分析是基于如下考量: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对一般家务劳动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客观家务劳动时间,本文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测量,可以将男性家务劳动时间及其影响因素与之前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通过对自我认定家务劳动承担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考察各类影响要素对于家务劳动分工影响的稳定性,尤其是当夫妻感情要素被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后,这样的一种尝试尤为必要。

性别角色观念。根据被调查者对 4 项问题的回答构建量表,分别是“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68,最高得分为 20 分,最低得分为 4 分,经极限标准化处理后生成了一个百分制计量的变量,其得分的高低反映了性别角色观念由传统到现代连续性。得分越高,越是趋向于现代性别观念;得分越低,越是趋向于传统性别观念。男性的平均得分为 53.1 分,标准差为 22.2,女性的平均得分为 61.3,标准差为 20.4。男性相比于女性在性别观念上更趋传统。

相对资源与绝对资源。(1)以经济依赖测量相对资源。采用 Brines 在 1994 年研究时曾经使用的方法,计算公式为(本人收入 - 配偶收入)/(本人收入 + 配偶收入),其值为 -1 到 +1。-1 表示被调查对象对他或她配偶的完全的经济依赖,+1 表示被调查者向其配偶提供了完全的经济支持,0 表示双方在经济上彼此没有依赖。该变量的均值为 0.37(标准差为 0.40),表示男性在经济上处于向其妻子提供较多经济支持的地位。不过从分布上看,有约 20%的男性经济依赖指标值小于 0,属于需要或多或少依赖其妻子的状况。(2)以丈夫年总收入测量绝对资源。考察与相对资源相比,是否绝对资源所体现的自主性对家务劳动的参与更为重要。年收入包括劳动收入以及加班收入及奖金等方面。2010 年城镇已婚在业男性的平均年总收入绝对值为 3.37 万元,高于其配偶的收入水平。

---

问卷对上述每个问题提供了五个选项: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太同意、很不同意。前三个问题回答选项的评分赋值依次为 1 分、2 分、3 分、4 分和 5 分,对于“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的赋值则为 5 分、4 分、3 分、2 分和 1 分。

用以检验时间约束理论视角的主要变量是工作时间,问卷中询问了被调查对象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以分钟为计量单位。男性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492分钟,略高于女性(女性为473分钟)。

夫妻情感。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暴力变量以测量夫妻情感状况。问卷询问了被调查对象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是否发生过诸如“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殴打、侮辱/谩骂、持续几天不理睬、强迫过性生活”的状况,以及在最近半年里这些状况发生的程度。其选项区分为“从未、偶尔、有时、经常”四类。如果被调查对象在整个婚姻生活中从未发生过任何来自配偶的暴力行为,则界定为夫妻感情好,如果曾经发生过且最近半年依然还发生过至少一项来自配偶的暴力行为,则界定为夫妻感情不好。数据显示,有19.9%的男性属于夫妻感情不好的状况。

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是年龄、家庭子女结构、职业类型、居住状况、健康状况、所在地区。(1)年龄。分为三个群体:29岁及以下、30-44岁、45-64岁,三个人群分别占8.0%、51.0%和41.0%。(2)家庭子女结构。分为四种情况:没有子女、有6岁以下子女、有6-17岁子女、有18岁及以上子女。四个人群分别占5.6%、17.3%、39.0%、38.1%。(3)职业类型。分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四个大类,四类人群分别占8.7%、15.9%、40.9%和34.4%。(4)居住状况。同住或相邻的父母也会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减少已婚子女及其配偶的家务量<sup>[31]</sup>,因此将居住安排也纳入分析,区分为两种情况:与老人同住(家中有本人父/母或者配偶父/母同住,占26.5%)、未与老人同住(占73.5%)。(5)健康状况。主要是考虑到其会影响个体的劳动能力,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根据问卷中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对于是否有慢性病和身体残疾等的回答,把健康状况区分为四类:很好、较好、一般、较差或很差,四类人群分别占10.4%、13.1%、35.9%、40.7%。(6)所在地区。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地区,分别占57.1%、27.0%和15.9%。

### 三、家务劳动差异影响因素及其解释

#### 1. 统计分析模型说明

对于客观家务劳动时间与主观认定家务劳动承担量的影响因素分析,所使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

表1 不同类型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分担

	客观家务劳动时间(均值/分钟)	主观认定家务劳动量
年龄		
29岁及以下	42.89	35.58
30-44岁	43.47	35.53
45岁及以上	47.49	35.97
家庭子女结构		
没有子女	52.40	41.90
有6岁以下子女	44.87	34.61
有6-17岁子女	42.50	35.06
有18岁及以上子女	46.75	35.97
职业类型		
管理人员	34.72	34.07
专业技术人员	46.90	37.83
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业人员	47.00	36.11
工人	44.52	34.65
居住状况		
与父母/配偶父母同住	43.62	34.16
未同住	45.60	36.28
健康状况		
很差或较差	47.27	36.32
一般	46.85	36.59
较好	47.53	35.92
很好	41.76	35.08
所在地区		
东部地区	45.95	35.91
中部地区	43.18	34.40
西部地区	45.09	37.17
夫妻感情		
好	45.91	35.92
不好	41.66	34.86

型模型中的自变量是工作日工作时间、性别角色观念、相对资源(经济依赖)、绝对资源(本人年总收入、配偶年总收入)、夫妻感情,控制变量为年龄、家庭子女结构、职业类型、居住状况、健康状况、所在地区。

模型1的自变量包括控制变量、工作日工作时间、绝对资源、相对资源、性别角色观念,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经济依赖的二次项,以考察西方学者经常检验的“性别表演”现象,在证明了存在“性别表演”的研究中,男性的家务劳动呈倒U型曲线,其经济依赖的二次项系数小于0<sup>[10][19]</sup>。模型3在模型

2的基础上增加夫妻感情变量,考察其对于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模型4为考虑了各类因素后的主观认定家务劳动量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 2.经验发现

(1)从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可以看出,男性做家务,无论是客观家务劳动时间还是主观认定的家务劳动承担量,均明显受到工作日工作时间、性别角色观念、经济依赖与夫妻情感的影响,但男性的家务劳动不存在“性别表演”现象。同时,家务劳动时间在不同生命周期、职业类型和健康状况的人群中差异显著。

(2)工作状况会影响男性分担家务劳动的多少。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从事有酬劳动时间越长,其家务劳动时间越少。每日工作时间每增加10分钟,男性的家务劳动会减少0.86分钟(见模型3),其自我认定的家务劳动量会减少0.08个单位,说明时间约束理论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男性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

(3)在控制其他要素情况下,性别角色观念可以相对独立地对家务劳动时间发挥作用。性别角色观念每增加1个单位,则客观家务劳动时间相应增加0.285个单位,自我认定的家务劳动量增加0.132个单位。即越是性别角色观念趋向现代男性,其家务劳动时间也越长。

(4)相对资源状况相比于绝对资源而言,对于男性的家务劳动具有更为重要而显著的影响。模型3经济依赖标准化回归系数值为-0.214,男性对其妻子经济依赖的程度每降低1个标准差单位,客观家务劳动时间会减少0.214个标准差单位。模型4经济依赖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66,男性对其妻子经济依赖的程度每降低1个标准差单位,主观认定的家务劳动量减少0.166个单位。由于经济依赖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因此,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不存在“性

表2 男性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N=3158)

	客观家务劳动时间 (回归系数)			主观认定家 务劳动量 (回归系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年龄:				
30-44岁	7.343 <sup>+</sup>	7.394 <sup>+</sup>	7.523 <sup>+</sup>	2.565 <sup>*</sup>
45岁及以上	7.975	7.755	7.997	2.321
家庭子女结构:				
有6岁以下子女	-1.490	-1.957	-1.353	-5.911 <sup>***</sup>
有6-17岁子女	-7.659	-7.686	-7.145	-7.783 <sup>***</sup>
有18岁及以上子女	-5.035	-4.884	-4.590	-6.960 <sup>***</sup>
职业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	10.210 <sup>**</sup>	10.267 <sup>**</sup>	10.461 <sup>**</sup>	2.564 <sup>*</sup>
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业人员	10.970 <sup>**</sup>	10.816 <sup>**</sup>	10.858 <sup>**</sup>	1.065
工人	11.670 <sup>**</sup>	11.501 <sup>***</sup>	11.522 <sup>***</sup>	0.483
居住状况:				
与父母/配偶父母同住	-1.349	-1.451	-1.404	-2.418 <sup>***</sup>
健康状况:				
一般	2.719	2.786	2.755	0.492
较好	0.457	0.672	0.384	-0.311
很好	-6.799 <sup>*</sup>	-6.773 <sup>*</sup>	-7.562 <sup>*</sup>	-1.271
所在地区:				
中部地区	0.447	0.185	0.302	-0.096
西部地区	-2.567	-2.666	-2.481	1.684 <sup>*</sup>
工作日工作时间	-0.085 <sup>****</sup>	-0.085 <sup>***</sup>	-0.086 <sup>***</sup>	-0.008 <sup>**</sup>
本人年总收入	-0.039	-0.027	-0.038	-0.066 <sup>**</sup>
妻子年总收入	-0.485 <sup>+</sup>	-0.541 <sup>+</sup>	-0.521 <sup>+</sup>	-0.016
性别角色观念	0.291 <sup>***</sup>	0.291 <sup>***</sup>	0.285 <sup>***</sup>	0.132 <sup>***</sup>
经济依赖	-19.725 <sup>***</sup>	-27.785 <sup>***</sup>	-28.307 <sup>***</sup>	-6.183 <sup>***</sup>
经济依赖平方		9.938	10.546	-0.711
夫妻感情			5.948 <sup>*</sup>	1.298 <sup>+</sup>
常数项	69.349 <sup>***</sup>	69.656 <sup>***</sup>	65.177 <sup>***</sup>	38.745 <sup>***</sup>
R平方/PseudoR <sup>2</sup>	0.091	0.092	0.094	0.125

说明(1)参照类。年龄:29岁及以下;家庭子女结构:没有子女;职业类型:管理人员;居住状况:未与父母/配偶父母同住;健康状况:很差或较差;所在地区:东部地区;夫妻感情:差。(2)<sup>+</sup>p<0.10,<sup>\*</sup>p<0.05,<sup>\*\*</sup>p<0.01,<sup>\*\*\*</sup>p<0.001。(3)模型分析时,对数据进行了加权。

别表演”的情况。即对妻子收入有依赖者,并不会因这种依赖而刻意少做家务,但也不会因为不需要依赖而刻意多做家务。

(5)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夫妻感情对于家务劳动时间有显著影响。夫妻感情好的男性会比夫妻感情差者每日多做一些家务劳动,大约是多6分钟,自我认同的家务劳动量大约是多1.3个单位。

(6)家庭子女状况、是否同住、所在地区对于男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多少并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主观认定的家务劳动量却有显著影响。主观认定的家务劳动主要反映了过去一年男性在主要家务劳动事项上相对于家庭其他成员投入时间的状况。可以看到,相比于没有子女的人群而言,无论子女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有子女的男性还是意识到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子女的照看等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妻子或者母亲)照看的事实。与父母或者配偶父母同住的男性,普遍认为所分担的家务劳动要少于没有同住的男性。相比于东部地区的男性,西部地区的男性自认为分担的家务劳动要稍微高一些。从男性所处的生命周期看,30-44岁人群的家务劳动承担量最高,日均家务劳动时间比30岁以下者高7.5分钟。

(7)对于男性而言,根据模型3和模型4的标准回归系数推断,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就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工作时间,第三是社会化过程中所认同的性别角色观念,即关于男性和女性什么样的分工合适、何以合适的认知,第四是夫妻感情。

####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减少,虽然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但男性也陆续参与到了家务劳动之中。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就对于男性家务劳动投入的影响最大。在中国现阶段的市场条件下,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时间投入与经济依赖有显著关系,具有经济依赖关系的一方会在家务劳动上有更多的投入。其次是受制于可用的时间,因此工作时间状况构成了对家务劳动时间的约束。再次是性别角色观念与夫妻感情,这些要素都相对独立地发挥影响。家务劳动的承担不存在“性别表演”现象,即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越是倾向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者,其承担的家务劳动越少,反之则越多。研究发现,家务劳动也是一种情感劳动,而非简单的劳动付出,或者是全然根据资源状况而理性精明算计的结果。夫妻关系主要是两个人基于情感而达成的一项社会契约,它的维系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家务劳动便是维系夫妻关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纽带,夫妻共担家务或者作为丈夫能够主动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有助于增加夫妻之间的互相信任、培养情感、有助于夫妻关系亲密与和谐。

本研究的新意是,在经验验证了时间约束、性别角色观念、相对资源视角之外,证实了家务劳动作为情感表达之存在。但由于本研究数据只是一个截面数据,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回归分析对于因果关系的解释尚有待后续研究的跟进。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佟新,周旅军.就业与家庭照顾间的平衡:基于性别与职业位置的比较[J].学海,2013,(2).
- [4]Godwin, D. D.. Spouses's Time Allocation to Household Work: A Review and Critique[J]. *Lifestyles*, 1991,12(3).
- [5]Ross, C. E..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J]. *Social Forces*, 1987, 65(3).
- [6]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Effort,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5, 3(1).
- [7]Coverman, S.. Explaining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85, 26(1).
- [8]Presser, H. B.. Employment Schedules among Dual -Earner Spouse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by Gender[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4, 59(3).
- [9]Sullivan, O..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among "Remarried" Couples[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97, 18(2).
- [10]Brines, J.. Economic Dependency,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100(3).
- [11]Williams, J. E. & Best. Sex Stereotypes and Trait Favorability on the Adjective Check List[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77, 37(1).



- [12]Thornton, A. & Linda Young-Demarco. Four Decades of Trends in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1960s through the 1990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1, 63(4).
- [1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4]费孝通.江村经济[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5]刘爱玉,佟新.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J]. 中国社会科学,2014,(2).
- [16]Shelton, B. A..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6, 22(1).
- [17]Blair, S. L. & Lichter. Measuring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Gender Segregation of Housework Among American Couples[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91, 12(1).
- [18]Sanchez, L. & Thomas Elizabeth. Becoming Mothers and Fathers: Parenthood,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J]. *Gender and Society*, 1997,11(6).
- [19]Greenstein, T. N..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 Interactive Effects of Wives' and Husbands' Gender Ideologi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96, 58(3).
- [20]Bittman, M., England P., Sayer L., et al.. When Does Gender Trump Money? Bargaining and Time in Household Work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3, 109(1).
- [21]Evertsson, M. & Neramo Magnus. Dependence within Families and the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ur: A Comparison between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4, 66(5).
- [22]於嘉. 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J]. 社会,2014,(2).
- [23]Baxter, J., Hewitt B., Haynes M..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d Housework: Marriage, Parenthood, and Time on Housework[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8, 70(2).
- [24]Bianchi, S. M., Milkie M. A., Sayer L. C.. Is Anyone Doing the Housework? Trends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J]. *Social Forces*[H.W. Wilson - SSA], 2000, 79(1).
- [25]齐良书.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05,(9).
- [26]周旅军.中国城镇在业夫妻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发现[J]. 妇女研究论丛, 2013,(5).
- [27]Chen F.. Employment Transitions and the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na[J]. *Social Forces*,2005, 84(2).
- [28]杨菊华. 从家务分工看私人空间的性别界限[J]. 妇女研究论丛,2006,(5).
- [29]Gupta, S.. Autonomy, Dependence, or Displ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ed Women's Earnings and Housework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H.W. Wilson - SSA],2007, 69(2).
- [30]Gupta, S. & A. Micheal. Whose Money, Whose Time?: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to Modeling Time Spent on House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J]. *Feminist Economics*, 2008, 14(1).
- [31]徐安琪,刘汶蓉.城市家庭经济压力 :一个社会脉动的视角[J]. 社会科学,2008,(2).
- [32]Erickson, R. J.. Why Emotion Work Matters: Sex,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5, 67(2).
- [33]Ferree, M. M..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wo-Earner Marriages: Dimensions of Variability and Change[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1991, 12(2).
- [34]Hochschild, A. R..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 [35]杨菊华. 传统与策略:1990-2010 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J]. 学术研究,2014,(2).
- [36]Erickson, R. J.. Reconceptualizing Family Work: The Effect of Emotion Work on Perceptions of Marital Quality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93, 55(4).
- [37]Kim Parker & Wendy Wang. *Modern Parenthood: Roles of Moms and Dads Converge as They Balance Work and Family*[M]. Washington, D. C.: Pew Research Center, 2013.
- [38]Sigle-Rushton, W. Men's Unpaid Work and Divorce: Reassessing Specialization and Trade in British Families[J]. *Feminist Economics*, 2010, 16(2).

责任编辑 玉静